

守望及变革

——论贾平凹四十年小说创作轨迹

李遇春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贾平凹自 1973 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创作历史,创造了许多经典的小说。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一直关注乡土、关注城乡互动中人的精神心理变化,借此,他为中国当代乡村献上了一曲哀伤的挽歌。贾平凹在创作原则或艺术形态上始终坚持以现实主义为主轴,早期小说曾受到革命现实主义的影响,中期小说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特点,后期小说创作又呈现出自然主义倾向。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是中国当代汉语写作史上一座重要的艺术丰碑。

[关键词] 贾平凹;小说轨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16)01-0022-06

DOI:10.13793/j.cnki.42-1020/c.2016.01.006

自 1973 年发表《一双袜子》以来,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纵观贾平凹四十年的创作历程,大致可以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3-1992)多以商州世界为重点,文笔清幽质朴,评论也以正面积极为主,其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浮躁》和“商州系列”小说,这一阶段是贾平凹小说创作的成名期和发生期。第二阶段(1993-2004)以《废都》的出版为标志,虽然《废都》争议较大,且直接波及其后创作的《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等长篇小说,但这一阶段可以视为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发展期和探索期。第三阶段(2005-2014)以长篇小说《秦腔》的发表作为标志,贾平凹凭借这部力作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又陆续出版了《高兴》、《古炉》、《带灯》、《老生》等长篇小说,均反响不俗,这意味着贾平凹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已经步入了稳健的艺术成熟期。

在小说创作的第一阶段(1973-1992)里,贾平凹以描写地域色彩明显的山乡风貌见长,正是这一山乡特色让文坛记住了贾平凹。贾平凹通过写作为家乡树立了丰碑,此一阶段可视为贾平凹的“立乡”期。这一阶段的创作又可分为前、中、后三期。

第一阶段前期(1973-1978)贾平凹的创作多为短篇小说,例如《一双袜子》、《新来的伯伯》、《菜园老人》、《满月儿》、《日历》、《秦声》等。这些短篇小说多采用素描画的方式,反映农村基层生活的面貌。除了清新的风景描写和生动的人物描写外,鲜明的时代特征是这一时期小说的重要特征。例如《满月儿》就鲜明地塑造了一对具有时代气息的农村少女满儿和月儿的艺术形象,小说结尾妹妹月儿与姐姐满儿之间的“矛盾”其实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科技知识,收获“胜利麦”。这一时期“贾平凹的创作是显示了作者自己的特色的,特别是着重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锻炼诗的意境,运用诗的语言,善于摄取生活中的一个断面折射出时代的面貌”^[1]。

第一阶段中期(1979-1984)贾平凹创作了《上任》、《下棋》、《山镇野店》、《夏家老太》、《年关夜景》等短篇小说。这一时期的小说已经少了“文革”时期小说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开始进入国民性批判的主题,例如《山镇野店》就是以批判国民奴性心理为主题。1983 年前后,贾平凹先后创作了《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等“改革题材”小说。贾平凹的改革题材小说着眼农村,从农村中的人事变化及

[收稿日期] 2015-04-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3BZW11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资助项目:CCNU14Z02017

[作者简介] 李遇春(1972-),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新旧思维的斗争来展现当时农村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这三部中篇小说现在看来,在表层叙事结构上有一定的模式化倾向,即潜在地延续着“文革”小说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思维模式,只不过由“资社之争”变成了新时期的“先进落后之争”。无论是《小月前本》中才才与门门的性格反差,还是《鸡窝洼人家》中回回与禾禾的不同选择,抑或是《腊月·正月》中韩玄子与王才的对立,从小说人物的不同命运中可以看出作者支持改革、鼓励开放的思想情感倾向。而贾平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这一时期的改革小说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表层叙事结构的政治化模式,而深入到了深层叙事结构的文化模式冲突中,尤其是《腊月·正月》中对两种文化模式的对立与对话的艺术透视,颇能揭示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文化心理结构变革。与同一时期的城市改革题材相比较,贾平凹的农村改革题材小说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主题先行模式,比较注重还原当时环境下的日常生活面貌。因而雷达评论他的小说重“性情”,即“他把社会的变革作为了产生他的人物情感冲突的原动力”^[2]。实际上,这一时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已经开始具有了他在艺术创作后期自称的“散点透视”式的特点。

1985年前后,受国内“寻根”文学思潮的影响,贾平凹开始创作并发表“寻根”系列中篇小说,其中包括散文化的“商州系列”小说以及《远山野情》、《天狗》、《黑氏》、《人极》等。在“商州系列”中,贾平凹继承了前辈沈从文“湘西世界”的乡土想象传统,将一个“想象”的商州世界带给读者。无论是“商州系列”中的珍子和刘成的爱情悲剧,还是《远山野情》中香香的苦闷,贾平凹均用白描式的笔调将山乡民众的情感纠葛和生存困境裸呈给读者。“商州系列”与同时期的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稍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以及之前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等共同建构起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极富文化意味的中国乡土想象格局。“商州系列”小说有意运用明清笔记小说的手法,“《商州初录》似乎是笔记小说的某种复活,然而其中又有地方志、游记、小品文等因素的融合”^[3]。“商州系列”小说开始让读者认识到一个神奇的商州世界,也开始让贾平凹意识到他真正的写作兴趣之所在。如果说“商州系列”是贾平凹初次尝试“立乡”的话,那么《浮躁》无疑是这一尝试取得的艺术硕果。

80年代中后期,贾平凹推出了他第一阶段的代表作《浮躁》。《浮躁》在整体思路上是延续着他的“农村改革三部曲”的,但重点已不在展现新旧势力斗争上,而是将探索者放在聚光灯下,将探索者在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真实而具体地还原出来。金狗的“浮躁”有些像《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又有些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他们都是年轻冲动的青年,有着自己的人生梦想,都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自身的命运。然而,这三个西部年轻人所秉持的人生信念和世界观有所不同,金狗与梁生宝和高加林的差异在于,金狗没有梁生宝那么强烈的共产主义信念,也与高加林简单的出人头地的愿望有所区别。金狗更多的是来自生命本身的躁动不安,而这种躁动不安与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风气相一致。因此,金狗的命运便成为那个时代许多人命运的缩影。“换句话说,金狗出现的必然就是中国社会自己内部寻求活力开始骚动的必然”^[4]。《浮躁》发表之后,引起了国内外强烈的反响,获得了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铜奖,贾平凹也因这部作品成为80年代红极一时的著名作家。需要指出的是,贾平凹在他第一阶段的乡土叙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其实一直在其后的创作中存在。比较一下同时期高晓声“陈奂生系列”中的批判态度、李杭育“葛川江系列”中的怀旧情感以及刘绍棠对京郊的诗意书写,贾平凹的《浮躁》更多地像是在时代思潮影响下的客观记录。随着贾平凹创作的不断深入以及其文学理念的不断演进,这种将情感深藏于叙事背后的小说风格已然成为贾氏写作的标签而独树一帜。

1989年,整个中国社会裂变及贾平凹父亲的逝世,使得贾平凹的创作意趣从“介入式”的时代描绘开始转向“回望式”的历史传奇。贾平凹继续传承“寻根文学”的薪火,创作了现代意识明显的“土匪系列”。“土匪系列”是收入小说集《逛山》中的四部中篇小说,即《美穴地》(1990)、《白朗》(1990)、《五魁》(1991)、《晚雨》(1992)。与此前注重商州地区当下乡村变化不同的是,“土匪系列”重在描写乡土历史传奇,通过人物命运的曲折变化来展现乡民们的生活之艰以及生存之困,其中《五魁》最为著名。《五魁》情节跌宕,多处安排出人意料。例如新娘被救回娘家后的“验身”、土匪白朗是一个美如妇人又武功高强的头目、新娘与狗交媾等情节的安排显然具有传奇性的追求。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冯骥才《三寸金莲》中的“裹小脚”、《神鞭》中的“辫子”,张艺谋《红高粱》中的“颠轿”、《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挂灯”。传统文化在这些作品中以臆造的方式充分满足了读者及观众对于“奇观异景”的窥视欲望。在90年代初现代性讨论

渐趋热烈,民族文化研究成为文学创作和文艺研究新方法的背景下,“土匪系列”的推出无疑暗合了这一文化思潮。除《五魁》外,《美穴地》也是一部中篇传奇,小说通过风水先生柳子言与四姨太之间一生的情感纠葛,嘲讽了柳子言事业与爱情的悲剧。还有《白朗》中的玉面匪首白朗、《晚雨》中的土匪天鉴,无一不在解释人在命运拨弄下的无常和颠沛。除了“土匪系列”外,贾平凹还创作了其他现代主义意味明显的小说,如笔记体小说《太白山记》,收录了《美好的侏人》、《火纸》、《故里》、《马角》、《二月杏》等,这些小说中体现出的传奇性可以说满足了现代人对于乡野之地的想象,这种想象既有东方神秘主义的传统,又满足了现代中国读者的本土民族文化想象。对此,贾平凹曾这样解释道:“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山区,山区一般装神弄鬼这一类事情多,不可知的东西多,这对我从小时起,印象特别多、特别深。再一个是有有一个情趣问题,有性格、情趣在里面。另一个与后天的学习有关。”^[5]其实,贾平凹小说对于神秘主义的偏好一方面是作家自身的兴趣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在90年代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作家对于传统文化“再审视”的态度使然。对于中国的“现代性想象”如何完成,传统文化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命运,贾平凹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并在小说创作中做了别具一格的艺术表现。

二

90年代初,当人们都认为贾平凹是乡土作家代表时,贾平凹的小说风格却为之一变。1993年,长篇小说《废都》发表在《十月》杂志上,后由作家出版社首印50万册。以后陆续出版大约有一千多万册,各种盗版不绝。《废都》是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第二阶段的高峰,也是他作品中争议最大的一部。同一部作品从最初的“洁本”到解禁后的“全本”,两岸三地曾先后出版十余种批判论集,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耀。近十年来学界对其评价也由诋毁之辞慢慢转为赞誉之声,这种文学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废都》是贾平凹的一次“转向”之作。以前,贾平凹关注乡村,关注乡村中发生的经济变化和人事变化。从《废都》开始,贾平凹开始关注城市,将他所置身的西安作为观察和思考的对象。另一个转向表现在作家早期质朴含蓄的文学风格突然变得放肆大胆。这让许多读者和评论家大吃一惊。这一时期,贾平凹由于个人家庭生活方面的变故,使得作者借助小说抒发其烦闷情绪。但原因并非如此简单,将《废都》置于时代背景下观察会发现,《废都》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记录”。

90年代初,中国结束80年代末的政治情结而一头扎进商业化狂潮后,应该如何面对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性追求,文坛内部是有很大大差异的。如果将贾平凹的《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这几部90年代长篇小说放在一起与同一时期描写城市的其他小说相比较,会发现贾平凹的城市题材小说其实代表了90年代城市小说的“新保守主义”的文化态度。与描写城市欲望的朱文的《我爱美元》、张欣的《掘金时代》、何顿的《我们像葵花》相比,再与描写城市小市民生活的池莉的《来来往往》、范小青的《城市民谣》相比,还有与描写大都市时尚生活的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相比,贾平凹对于城市化浪潮的“新保守主义”的态度和悲观立场,显然与之截然不同。贾平凹90年代的城乡书写其实代表着在城市化浪潮刚刚兴起不久,如何面对这一新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态度差异。写作《废都》对于贾平凹其实并不容易,完全是一次“心灵的挣扎”,要想“毫无讳饰地展示这个光怪陆离的浮躁时代、晕眩时代的生活本相,尤其是世俗化、民间化的本相,留下一部珍贵的世情小说”^[6],其实需要对于时代以及“性”“情”有自己的体认后,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

《废都》中的人物关系模式以及性描写是早期评论《废都》时常常遭人诟病之处。即使到了新世纪,对《废都》持批评态度的批评家仍然认为“《废都》是一部缺乏道德严肃性和文化责任感的小……它缺乏‘携带他人走向完美’的热情和力量……在《废都》中起作用的是腐朽的、粗野的享乐主义法则,是以丑恶和黑暗为支点的反文化的法则。它以其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叙事,助长了我们时代的道德混乱趋态和颓废、堕落倾向”^[7]。对此,也有一些评论家对于贾平凹以及《废都》所受到的批判持同情态度,认为《废都》中所描写的性“其实是可怜的性。是在现实的重重包围中偷偷摸摸的‘两性相悦’,这个‘悦’差不多是庄之蝶精神上的救命稻草……庄之蝶的‘颓废’是在社会的围困中偷偷摸摸的‘颓废’。这不仅是说外在行为上的‘偷’情,而且更是说他精神上的痛苦处于黑暗的、不见人的状态中”^[8]。这种同情确有几分道理,要知道知识分子在90年代初的文化命运岌岌可危,否则也不会在《废都》之后掀起那么一场“人文精神大讨

论”。如何观察当代社会世情,如何理解消费社会带来的消费欲望的扩张,这些问题使得以文学为载体的传统知识分子遇到了相当大的挑战。庄之蝶的自我放逐既是人物自身的文化选择,又像是一个时代精英文化传统衰落的象征。陈晓明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认为《废都》与它的时代之间已成为“共证”关系:“平心而论,《废都》相比较当时乃至现在的大多数小说在文学性上,或者在叙述形式上,或者在艺术语言上都可属于上乘之作,但毫无办法,谁也拯救不了《废都》。《废都》就像一张招贴画,被牢固地张贴在历史之墙上,谁也揭不下来,无法还其纯粹的文学之身,只要揭下来,它就破碎不堪。”^[9]

无论如何,作为历史之镜的《废都》让贾平凹在评论家的眼中很快由一个清新怀乡式的作家变成了情色文学家,许多人当时阅读《废都》其实并不关心作品本身的内容,而是随着庄之蝶与妻子牛月清、情人唐宛儿、阿灿及保姆柳月的四角关系想象性地完成了一排排省略的□□□□文字内容。如果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来理解《废都》,实际上,在网络传媒没有产生,而公共媒体严格控制的氛围下,小说成为许多读者完成性想象的主要媒介之一。而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政府及文化主管部门将《废都》列入了当时“文化清洁”运动的主要对象之一。双方讨论的焦点都不在文学的层面上进行,而变成或是个人道德的讨伐,或是作者隐私的暴露。即使这部作品到了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快结束时,仍然有海外华文作家吃惊于《废都》中的性描写,称其为“迷失方向之作”^[10]。因此,当《废都》印数达到一千万册时,就连贾平凹自己也意识到了其间隐藏着很大的问题,但他已无能为力了。这样看来,陈晓明关于《废都》的“历史招贴画”的比喻还是相当准确到位的。

《废都》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并没有给贾平凹以后的几部小说带来积极的影响。相反,《白夜》(1995)、《土门》(1996)、《高老庄》(1998)这几部小说所获得的评价均不太高。其实这几部小说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变革中的城乡关系变化。《白夜》看似描写夜郎与虞白、颜铭的感情纠葛,以及夜郎失败的城市经历,但关注的重点是夜郎城市生活中的境遇。与《废都》中借用一头奶牛来表达作者的“文化守成主义”立场不同的是,《白夜》中的叙述者开始退居其次,让人物与人物之间构成了“复调”般的对话关系。夜郎、颜铭、南丁山、邹云都是一群城市的“游荡者”,每日的生活虽然忙忙碌碌、琐琐碎碎,但却在个人前进的道路上始终有着“玻璃顶层”般的阻碍。这种阻碍一方面有主人公自身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西京城始终无法对夜郎们开放,导致其始终走在边缘处游荡所致。《土门》思考的问题仍然是城乡关系问题。作品中成义变成捍卫乡村文化的脆弱的守护神。正如他神秘的“女左手”一样,成义肢体的残缺也暗示着他抵抗的无力。《高老庄》是一次沿着《土门》思绪的“回乡之旅”。语言学教授子路与妻子西夏衣锦还乡,却显出种种的不适应。子路的不适应正是处于城乡两极文明生存中人物的尴尬处境。小说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原本打算回乡生子的教授子路“不行”了,原本商量的怀孕计划也只好延缓,他们面临着“种”的危机。《高老庄》描写到了人种的退化,而《怀念狼》中则写到了狼种的退化。《怀念狼》现在看来已是生态文学的范本之一。90年代以来,贾平凹一直在关注生态问题和环境恶化下人的遭遇,从他的小说中一直存在的对“神秘现象”的关注及城乡环境的对立冲突可以感受他写作中的“紧张”。贾平凹写作中的“紧张”源于他失守的精神家园,贾平凹希望通过表达家园沦丧和种的“退化”一类的主题来反思现代性行进中的利弊得失。家园的失守意味着以重视乡土文学写作的贾平凹创作危机的到来。在《怀念狼》中,贾平凹将这种情绪抽象为一个孤独的意象——“狼”。“狼”作为原始乡土的象征,正如姜戎的《狼图腾》或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一样被赋予了许多文化含义。

三

《秦腔》是贾平凹的一次“归乡”之旅。贾平凹在创作《秦腔》之前颇为犹豫,《废都》之后的长篇小说除了《高老庄》之外评价普遍偏低,加之年龄的紧迫感和文学的使命感,使得贾平凹打算再次回到故乡,为故乡写史。《秦腔》正是贾平凹打算以故乡棣花街为原型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动笔之前,贾平凹特意焚香告慰已逝去的棣花街上的先灵,之后在他的“上书房”中开始构筑小说《秦腔》。2005年,小说在《收获》上连载。2008年,《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秦腔》的获奖不仅廓清了以前关于《废都》的纷纷攘攘,奠定了贾平凹在中国当代汉语写作史上的地位,而且让以前人们对贾平凹“江郎才尽”的怀疑烟消云散。《秦腔》无疑是贾平凹小说创作生涯中的第三座高峰。

进入《秦腔》容易,理解《秦腔》并不容易。因为《秦腔》“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11] 565。初读《秦腔》的读者很容易陷入叙述的迷阵中。然而,了解贾平凹的读者却能理解他作品中那种琐碎叙事风格的成因。贾平凹的创作整体上是现实主义为主的,民间文化或者宗教文化只在他的创作中穿插渗透。早期贾平凹现实主义风格创作还带有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的影响,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情绪。此后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虽说无论是“土匪系列”还是“商州系列”,抑或 90 年代的长篇小说系列都是乡土叙事或城乡传奇,但现代主义的思潮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贾平凹小说风格的形成。新世纪以来,贾平凹的现实主义风格又为之一变。琐碎的生活细节描写背后是贾平凹对于生活细致的观察,贾平凹开始重拾新写实主义风格的余薪,甚至变成类似自然主义的实录。其中《秦腔》表现得最为明显。《秦腔》起笔时,贾平凹心中忐忑,感觉自己像一个只会讲旧故事的老者,但怀着“总有吃面的主儿吧”的自信,贾平凹将目光再一次投往乡里,投向过去。熟悉贾平凹创作的读者都知道,贾平凹总是从身边真事起笔。《秦腔》中的引生、《高兴》中的刘高兴、《古炉》中的狗尿苔、《带灯》中的萤,这些人物在贾平凹生活中均真实存在。贾平凹一边观察着他们,一边将他们的故事与自己对于城乡变化的思考融为一体,让他们在作品中为自己代言。

谢有顺称誉《秦腔》有“文学整体观”,即文学的四个维度兼具:一是“国家、社会、历史”维度;二是叩问存在意义的维度;三是超验的维度,即与神对话的维度;四是自然的维度^① [12]。谢有顺认为“《秦腔》依然贯彻着贾平凹的文学整体观。同时,贾平凹在这部作品中还建构起了一种新的叙事伦理”^[12]。这一套新的叙事伦理即从线索式的叙事模式开始转向琐碎的细节、散漫的对话以及隐匿的叙述主体的方式来结构全篇。这样的叙述方式对于贾平凹而言是一次大胆的“背叛”,背叛着作家自我表达的欲望以及阐释主题的冲动。五十多岁的贾平凹在叙述中愈发“成熟”起来。不仅如此,这种叙述风格也是对新世纪乡土写作风格的有力回归。新世纪的当代文坛并没有与中国高速的现代城市化进程保持完全一致,相反,有许多优秀中长篇小说都是以乡土生活为背景的。无论是激愤如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还是荒诞如阎连科的《受活》,抑或是神秘如来来的《空山》,都是如此。我们会发现,新世纪的乡土叙事不仅没有走向衰落,相反,迎来了新一轮的创作高潮。贾平凹的《秦腔》以及其后的《古炉》、《带灯》、《老生》成为新世纪乡土叙事的重要文本。正如陈晓明所预言的,《秦腔》作为乡土叙事的终结和开启,在新世纪具有新的美学意义^[13]。

《秦腔》完成了贾平凹为故乡立传的宏愿之后,他又创作了四部长篇,即表现底层题材的《高兴》(2007)、“文革”题材的《古炉》(2010)、“维稳”题材的《带灯》(2013)、史诗题材的《老生》(2014)。这四部作品关注的重点不一,但对乡土变迁中农民身份的关注焦点却没有改变。《高兴》是贾平凹第三部描写城市题材的小说,小说描写乡下人如何进城。乡下人进城的方式有许多种,有如孙慧芬的《民工》、马秋芬的《蚂蚁上树》中描述的建筑民工,也有如张抗抗的《北京的金山上》等小说中所描述的拾破烂者,还有王祥夫的《米谷》中的讨饭群体。虽然这些人群进城方式不一,但谋求城市较高水平的生活,并逐步成为城市人的目标是一致的。《高兴》中的主人公真正“进了城”,开始城市生活。与米谷(王祥夫《米谷》)、国瑞(尤凤伟《泥鳅》)中的惨烈下场相似,刘高兴的结尾也是悲剧性的,他们对于城市玫瑰色的想象显然与城市的现实差距明显。五福的“身死”象征着刘高兴的“心死”,刘高兴背着另一个自己走上了伤感的“落叶归根”之旅,他的落败意味着贾平凹精神世界中的再一次防守和撤退。

新世纪以后,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有了自觉地为国立命的使命感。年届甲子之时,贾平凹又开始书写“文革”。如同《秦腔》是一本记录原乡生活的小说一样,《古炉》(2010)也是一本贾平凹写给自己故乡的大书。“文革”叙事一直到新世纪文学中依旧存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的叙事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 80 年代“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的“文革”控诉型叙事模式,也不属于像某些“后知青小说”那样去简单化地解构历史,而是秉承着新写实主义的艺术还原手法去再现复杂的原生态的“文革”日常生活史。如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刘醒龙的《弥天》、余华的《兄弟》(上)、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苏童的《河岸》、莫言的《生死疲劳》、林白的《致一九七五》、毕飞宇的《平原》等长篇都是如此。与以前情绪化的控诉或怀念不同的是,新世纪以来的“文革”叙述大多如水般流淌,悲喜皆在细腻处凝聚。《古炉》中的“文革”场景与之前的“文革”叙事中的暴力景观不同的是,它具有很明显的诗意化特征。革命的荒诞与田园景观的诗化形成了令人吃惊的“对话关系”,这让人不禁想到了沈从文的《长河》:“回到《古

①这是刘再复答香港作家颜纯钧、舒非问题时提出的观点。见刘再复《答〈文学世纪〉颜纯钧、舒非问》,《文学世纪》2000 年第 8 期。

炉》,我认为贾平凹的书写位置和沈从文的《长河》有呼应之处……两者都让政治暴力与田园景象形成危险的对话关系。”^[14]王德威的警惕却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贾平凹新世纪写作的特点:自然主义的倾向。即使如“文革”这般的大事件,在贾平凹看来,革命风潮终抵不过泼烦日子、日光流年。

2013年《带灯》的出现并非偶然。新世纪初,由于贫富差距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底层文学开始出现。曹征路的《那儿》、《霓虹》等小说表现了底层文学中的城市面貌,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描写的是贫富分化引起的乡村暴力。底层叙事除了上述激烈的情绪外,再有一种风格便是如《带灯》般日常叙事中的底层绝望生活。《带灯》是贾平凹的再一次“贴地行走”与“诗意飞翔”的结合^[15]。所谓“贴地行走”指的是小说反映的是当下中国乡村最尖锐的社会现实。“诗意飞翔”则指的是带灯始终对自己的生活充满期待。带灯如菩萨一般被萤火虫围绕的结尾,读者明知不可能,但总能给寒冷的长夜带来一丝慰藉。中国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序列中尚无类似的形象。《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新星》中的李向南,以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我们在这些人物身上感受到主人公为集体呕心沥血、奋勇向前的毅力和果敢^[16]。然而,带灯犹豫了。带灯用尽心力,与上级官员和下层民众不断斡旋,结果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械斗将带灯打回原形。但步入老年的贾平凹并没有像带灯那样绝望,他很快就开始更加宏观地艺术反思百年乡土中国历史整体进程。2014年“文坛劳模”贾平凹发表了最新长篇《老生》,作者试图在这部作品中从民间视角写史。《老生》用四个小故事的联缀方式从不同角度把握百年乡土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怪圈和悖论。小说的叙事人唱师经历了抗战、土改、“文革”及新时期,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他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及其逝者哀歌。小说别具匠心地将《山海经》古典文本穿插其间,而且四个故事与《山海经》之间形成了奇妙的互文关系。

总之,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四十年是不平凡的四十年。这四十年间,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坛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贾平凹一直在坚持创作,这在中国当代汉语写作史上是不多见的。贾平凹如入定的老僧一般,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但是,贾平凹并非一个固步自封的作家,相反,他十分善于吸纳文学新潮和艺术技法,但这一切都经过了贾平凹个人化的思考和凝练才落笔于作品中。贾平凹谦虚地说自己是一个落后于文坛半步的人,但正是“慢半步”的贾平凹一直站立于中国当代文坛的潮头,不断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焦点人物。从《浮躁》到《废都》、从《秦腔》到《老生》,贾平凹走过了一个循环,这正是一次“立乡——离乡——归乡”的精神之旅。贾平凹在一次次的写作中表达着他对故乡的深情,为故乡立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和艺术的丰碑,同时也正是故乡让他成为中国当代西部文学中的重镇。

[参考文献]

- [1] 王愚,肖云儒.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J].文艺报,1981(12).
- [2] 雷达.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J].读书,1986(7).
- [3] 李振声.商州:贾平凹的小说世界[J].上海文学,1986(4).
- [4] 刘火.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J].当代作家评论,1989(4).
- [5] 贾平凹,韩鲁华.关于小说创作的问答[J].当代作家评论,1993(1).
- [6] 雷达.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J].当代作家评论,1993(6).
- [7] 李建军.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评《废都》[J].南方文坛,2003(3).
- [8] 张新颖.重读《废都》[J].当代作家评论,2004(5).
- [9] 陈晓明.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J].当代作家评论,2006(3).
- [10] 霍汉姬.莫将粉丝当鱼翅——我看贾平凹现象[J].当代文坛,2007(5).
- [11] 贾平凹.秦腔·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 [12] 谢有顺.尊灵魂,叹生命——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J].当代作家评论,2005(5).
- [13] 陈晓明.乡土叙事的终结和开启——贾平凹的《秦腔》预示的新世纪的美学意义[J].文艺争鸣,2005(6).
- [14] 王德威.暴力叙事与抒情风格——贾平凹的《古炉》及其他[J].南方文坛,2011(4).
- [15] 吴义勤.“贴地”与“飞翔”——读贾平凹的长篇新作《带灯》[J].当代作家评论,2013(3).
- [16] 陈晓明.萤火虫、幽灵化或如佛一样——评贾平凹新作《带灯》[J].当代作家评论,2013(3).

[责任编辑:熊显长]

Abstracts of Main Essay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Popularizable Moral Doctrine: Possibility and Limitation

YAN Hui

Each value in this world can be proved, but not each of them can be confirmed. This kind of value must belong to “ought to be”. Kant confirms that his principle “human beings should be treated as ends rather than as means” is the most basic and highest moral law which can be universalized. The moral law is “thought to be a correct value”. At the same time, as a moral law which can be practiced and realized, it has a closely correlation with the modern society. In order to turn these moral laws into actualized moral principles, those universalized laws must be changed into certain principles like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n economics, justice and equality in politics and respect and modesty in public relationship. Furthermore, an individual’s moral obligation and an organization’s moral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specified. Only in market can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universalized moral laws come true.

Study on JIA Pingwa’s Literary Writing Themes and Styles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Perseverance and Adaptation

LI Yu-chun

It has been more than 40 years since Jia Pingwa published his first novel in 1973, and he has produced a number of classic novels. Through combing his fictions in these forty years,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ain that Jia Pingwa continuous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countryside and people’s emotional changes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which contributes a sad elegy up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ountryside. In his novels, he always insists on the realism, the early novels are influenced by the revolutionary realism, and the intermediate stage has a characteristics of magic realism, and his later creations show a tendency of naturalism. Jia Pingwa’s works are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Etym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ZHONG from th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CHEN Dao-de, GAO Yong-han

“Zhong”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consists of “flags” and “drums” from the origin of this character, suggesting that it represents the “central authority” of one group or tribe. It could be discovered that there is an evolution process from “physics” to “metaphysics” when people are trying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Zhong”. In the beginning, “Zhong” represented the central location of one group or tribe, and later on it was developed into “the center” of the space and formed the phrases of “the center of earth”, “the center of sky” and “the center of universe”. “Zhong” was still used in the meaning of physics though the meaning began to be abstracted and activated. With the further abstraction of “Zhong” by Confucius and other philosophers before *Qin* Dynasty, there came into the meaning of philosophy and formed important philosophy terms, such as “golden mean” and “golden Taoism”, which means that the meaning has been converted into the metaphysics from physics, while the worship and respect of Chinese people towards Zhong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is great leap.

Study on the Early Confucian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Monarchism Legitimacy and Some Other Issues from the Recordings of Shanghai Museum Chu-bamboo Tablets

DING Si-xin, ZOU Xiao-yu

From the view of Shanghai Museum Chu slips, the attitudes shown by early Confucians toward the legitimacy of regality and other related questions are as the following: Firstly, regality originates from *Heaven* (天) and *People* (民) and its aim is to realize “*Tianxia weigong*” (the great harmony), which is the ideal of rule of virtue. It also means to build such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which people could settle down, get on with their pursuits and accomplish themselves.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regality—in essence, is a “common tool” (“公器”) which comes from people and is ultimately used for them. Secondly, the three bases of the